中国科学报

纪念改革开放暨恢复高考40年 院士忆高考 ③

本报与湖南大学党委宣传部、湖南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

40 年前,“地理”选择了我

■傅伯杰

1977 年的那场高考,对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大考,却不是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因为,直到高考前十天,我才得到报考的资格!尽管这个机会来得那么一波三折,我几乎来不及思考,甚至来不及紧张,就走进了考场……

傅伯杰

1977 年 12 月参加高考,1978 年 2 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自然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主要从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研究,在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推动了中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现任国际生态学会副主席,国际长期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副主席,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 主编,*Landscape Ecology*、*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等国际期刊编委。201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来不及紧张的一次大考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教师家庭,学习、识字很早。1963 年刚满 5 岁,我就喜欢趴在父亲学校的教室窗口。老师在教室里提问,我就在窗外举手回答。老师一度嫌弃我捣乱,可在我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师竟然同意收了我。就这样,我的学习生涯从蹭课开始了。

1974 年元月,我从陕西省咸阳市第十五中学毕业,去农村参加劳动。由于成绩优异,我在农村的学校做过任课老师,在政治夜校组织当时的知识青年学习、赛诗,相继担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副书记。

满两年的农村劳动实践,一度让我够格赶上最后一届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所在的公社一共有三个入学名额,以我的表现,若不出意外,应该在 1976 年成为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谁料,在最后一刻被人挤占。

沮丧之余,我必须坚定自己的想法。虽然大学梦落空,但只要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不管什么学校,都不放过。巧合的是,我随即收到了市招办的通知,可以进入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学习。

咸阳机器制造学校是一所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中专学校,在机械制造领域颇有实力,尽管“社来社去”,我还是在 1977 年 1 月进入了学校,分配到一个当时最好的专业——机床电气专业。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9 个月之后,进入大学的机会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工厂车间的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和很多同学一样,我立即准备报考。

然而,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依据当时的规定,我们这些学生已在中专学习,与当时社会上的青年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都不同,没有报考资格。

回想我的大学之路,称得上是一波三折,好在最终还是峰回路转。

就在高考前十天,学校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群学生被允许以高中在校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前提是,考试名额有严格限制。

整个咸阳机器制造学校有 130 多名学生报名,但高考名额只有 30 个。因此,我们必须先参加学校组织的排名考试,争夺高考资格。幸运的是,我的成绩位列第一。

那时,距离高考只剩一周时间了。

“能考上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的初中和高中时期经历了“文革”动荡的年代。学制分别被压缩到了两年和两年半,尤其在初中阶段,除了语文、数学,几乎就没有系统地接触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知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比较实用的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课程,学习基本处于荒废状态。到了高中阶段,正值邓小平恢复主持工作,学校氛围稍有改善。进入中专,我主要在车间学习实践技能,这些知识距离基础科学很远。

1977 年 12 月,我走进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子弟中学,参加第一门数学考试。我所在的考场大约有 50 人,我的邻座是位高六六“老三届”考生,他一见我就问,“学没学过数列极限”。极限理论是高等数学的基础之一,而我们在高中甚至连三角函数、立体几何都没有接触过。我只好苦笑着说“没有”。

开考之前,监考老师“宽慰”考生们,要放松情绪,不要紧张,在他看来,“咱们一个考场能考上一两个就不错了”。

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采取自主命题的方式。陕西省数学卷比较有难度。虽然今天看来,那些难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低年级的水平,可对几乎没有时间复习,基本原理还没能认真吃透的我们来说,足以构成一种障碍。

好在,政治、语文和物理化学考试没有太过“为难”我们。记得,当年二选一的作文题,一个是“难忘的日子”,另一个是“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我选择了前一题,把 1977 年 4 月 15 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的日子作为了叙述的对象。物理化学考试,我完成了十题中的九道题。没能答上来的是一道化学题,由于我对那个反应方程式一无所知,所以无法计算分子量。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考完第一门数学以后,下午参加政治考试的学生人数足足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我所在的考场,最终完成全部四门考试的人数在 60%左右。

或许是考试时留意到我的答题情况,监考老师在考完最后一门考试时单独通知我,让我作为该考场的代表参加教育局、招办举行的考生座谈会,提供针对此次考题的一些反馈。

这次高考对我而言还是太过匆忙,以至于我在考完以后也并未把结果太当回事。随着寒假的到来,我安心回家准备过年。

高考后,考试成绩并未正式对外公布,但陕西省初选了一部分考生参加体检,咸阳机器制造学校 30 人高考,有 15 人都进入了体检名单。然而结果依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15 人中,最终只有我一个如愿进入了大学校园。

和时间去争去抢

1978 年 2 月末,来不及与咸阳机器制造学校的同学有更多交流,我就办理了退学手续,去陕西师范大学报到。在我的同学看来,这所大学并不尽如人意。

受时代发展需求的影响,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的第一选择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第二选择是西安交大无线电专业,第三是西北工业大学。可我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上,却写着“地理”两个字。

我一度怀疑是学校错把“物理”写成了“地理”。因为我认为地理是个文科专业,大家调侃到“认识五百汉字,就能学地理,学地理还需学四年”。

事实上,当时陕西师大地理系招收的七十名学生,除了两人,其余都是被调剂到该专业的。有同学甚至为此找到省招办理论,不愿服从调配。归根到底,这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专业缺乏了解。

带着对地理学还有师范类学校的偏见,我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

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学校的食堂。经历过自然灾害、上山下乡的困难时期,我们这群年轻人第一次享受到了丰富的食物。早餐居然能有点心吃,这在当时是一种奢侈。

作为文理兼有的综合类高校,我很快被它浓浓的学术和文化艺术氛围所吸引。图书馆复古的建筑设计漂亮极了,我记得,在它门口还有两棵巨大的雪松,从建校起,它们就矗立在那个位置。

我们开学没多久,全国科学大会就召开了,这场“科学的春天”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那次大会前,《人民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已经传遍全国。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荡气回肠,它让广大青年认识了科学钻研,认识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这也让我们的大学校园充满了渴望知识,积极求索的氛围。

那是我们经历了知识和精神匮乏的年代后,喷涌而出的一股力量。因为我们失去过,所以我们必须和时间去争去抢。所有学生都不约而同拼了命地学习,泡图书馆,看文献,宿舍熄灯后到路灯底下继续自习。这是现在的年轻学生们不可想象的。

也是在那时候,我养成了记录读书笔记和科研笔记的习惯,当年的一些笔记本我至今还保留着。对我而言,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目标要投身科学,但我对知识的欲望从未这样强烈过。

野外实习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对地理学渐渐有了感觉。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文理均衡发展的学生,而地理学恰恰是结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地貌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工业地理学、气象学与气候学等等。我意识到地理学“综合”的特点,非常符合我的兴趣。

到了大三下学期,学校聘请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一位华裔教授来为我们讲授三门专业课程。他的到来,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行为地理学等崭新的概念,一下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如此复杂的地理学必须用复杂的方法来解决,科学还没有完全攻克复杂系统的问题,可探索的空间还很大。

除了强化基础知识,当年我们地理专业的重要特点就是野外实习。直到今天,我仍然告诉我的学生,大学丰富的野外实习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1978 年 10 月,我们在第二学期就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测量与地图野外实习,为一个矿区测绘一张 1/2000 的地形图。此后,每学期的假期实习都是雷打不动的,少则两周,多则一个月。这是我们与现在的地理学科训练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到了研究生期间,我们的野外基本功训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我几乎跑遍了全国,高原、冰川、荒漠、海岛……我对每一个地区的土壤、植被群落、水文、地貌都有清晰的了解和记录。

每一次,我们都背着被褥出发,到了夜里,就睡在废弃的厂房或仓库里。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我们始终乐在其中。除了专业能力的提升,它也为同学之间创造了牢固的情感连接。

记得本科在汉中进行地质实习时,除了陕西师大,还有西安地质学院、西北大学地质系、甘肃师大的团队。起先,大家常常“各自为战”,吵作一团,到了最后,大家一同生活、学习,组织文娱活动,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

本科阶段,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老师是教授中国自然地理的刘胤汉老师,他也是我后来的研究生导师。刘老师的课很有特色,他每次都随身带着两大本巨厚的《中国土壤》和《中国植被》,重重地往讲台一放,颇有气势。在那个没有投影仪的年代,刘老师常常把书中提到的图片让我们传阅浏览。

刘老师教学极为严格。1981 年大四综合实习期间,我们坐了将近 20 个小时的火车从西安到达安康,刘老师却要求我们当晚就开始自习安康自然地理状况。不明情况的一些同学事先进城买好了电影票,准备放松一下。身为学习委员的我只得请求刘老师,通融一次。事后,刘老师十分生气,严厉批评了我们的行为。当时,刘老师留下了一句名言,“你们把学习搞好了,到时候有小车请你们去看‘大篷车’(电影)”。

大学四年,共 26 门课,最终我以全优、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1982 年上研究生后,我写了并于 1983 年发表了国内景观生态学方向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学的新领域——景观生态学》,使我几十年一直从事景观生态学研究。在我的整个学习生涯中,如果说,刘胤汉老师帮助我立足本土,打下扎实的学科基础。那么,我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林超先生,则是为我彻底打开了国际视野。在他的争取之下,我成为了国内第一批出国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去英国接受大师教诲,接触国际前沿。这也是我成为导师后,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的理念。

(本报记者胡珉琦采访整理)

①1982 年沙漠考察
②本科毕业证
③实习笔记
④陕西师大三好学生奖励

文化微议

涉嫌抄袭新书遭下架

近日,湖南电视台记者曹萍波所著的《万物赠我浓情蜜意》一书被指抄袭。某公司旗下作者杨云苏称,该书大量抄袭了自己近年来的微博帖文,并提供了两者文字比对的证据照片。在确认抄袭属实后,湖南文艺出版社已正式发函,通知各大网站、新华书店及民营经销商将此书下架。

杨云苏发现,《万物赠我浓情蜜意》52 篇文章中,与她过去五六年间发表的微博帖文有雷同语句的多达 39 篇。“该怎么界定你的行为呢,对我帖文的使用你大致有 4 种手法:斩段儿,切片儿,包丝儿,剁馅儿。曹萍波女士,你怎么能这样?”

曹萍波在微博致歉:“因法律意识淡薄,在《万物赠我浓情蜜意》一书写作过程中摘录了杨云苏老师微博文字,而未注明文字来源,给杨老师带来了伤害,在此我诚恳地向杨老师道歉。”该书中文章原刊载方《三联生活周刊》也发表声明,称已将这些文章从杂志公众号中删除。

而曹萍波的另一本新书《草舍无瓦,市井有人》,杨云苏发现该书除了抄了自己的博文之外,还抄袭了张爱玲、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等名家。

点评:互联网时代,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时代,抄袭大概是“家常便饭”,才会导致这位抄袭者“法律意识淡薄”,出版商也睁一眼闭一眼。所以,除了道歉,走一趟法律程序是不能少的。

兵马俑“携手”动漫

近日,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与新浪动漫进行战略合作签约,双方宣布达成在兵马俑系列文创产品项目上的深度合作。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院长侯宁彬说,在“互联网+”的时代,以文物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需要有新的发展突破。此次在兵马俑系列文创产品项目上的合作,意在将互联网和动漫的创新成果与兵马俑进行深度融合,全方位立体打造兵马俑 IP 品牌。

兵马俑系列文创产品开发项目将结合文物原型,设计制造现代青少年群体易于接受和欣赏的兼具艺术性、趣味性和实用性的文创衍生品,通过线上线下文创衍生品开发、售卖、互动、体验为主的大众文物鉴赏及文物消费场景,打造一个全新的文物价值再开发生态体系。

点评:是不是在不久之后就能看到或者帅气或者超级萌的兵马俑?

日常用语一键变诗词

近日,搜狗公司称,搜狗输入法的“好诗替换”“妙词替换”等十余种功能所构建的表达生态圈正式亮相。

搜狗公司 CTO 杨洪涛表示,他们试图将场景变得更丰富,让人们使用后更有文采、有知识或者更加风趣幽默。比如,搜狗输入法“好诗替换”,“不想上班”一词可以替换成多句古诗词。

杨洪涛表示,这是他们在 3.0 迈出的第一步,“基于不同的场景和需求,我们在结合了语意分析和文本匹配技术的基础上,搭载了大概有 60 万以上的诗词、500 个以上的细分主题,由此推出了‘好诗替换’功能”。

“好诗替换”囊括的表达范畴包括基础情绪、时间节序、自然风光、生活器物、人生经验等多个大类。对应的内容除了古典诗词,还有现代诗、俗语、网络流行语、民谣歌词等,目前,这个词库还在不断更新中。

点评:要看到技术不断升级过程中的利弊,仅对用户而言,一方面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和体验,另一方面,又让我们懒于思考和记忆。

旧照片里的中国记忆

家里买了“奢侈品”电视机、电冰箱,要站在前面留影一张;六一当天,每一个孩子都会被涂上红脸蛋,登台表演节目;等等。上世纪 80 年代没有数码相机,拍照成了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

这些照片全都出自普通老百姓之手,没有任何技巧,甚至被废弃。而帮中国人保留这段集体回忆的,是一个法国收藏家苏文。前些年,他留意到底片,“这是容易被忽略的东西,数码相机普及后,胶片正在消失”。他就在网上找到专门处理含硝酸银垃圾的人,先后以每公斤 28 元的价格购买了几十公斤底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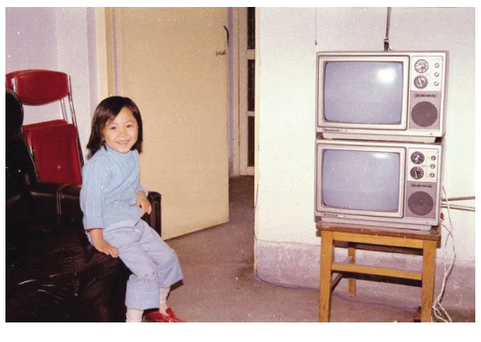
刚开始,苏文并不知道要做什么。这件事既耗费精力,又花钱不少,他有些迷茫。直到他发现,这些照片中反复出现中国人与电视机、与冰箱的合影,才开始构思改革开放的主题。

“这是中国人集体的时代记忆。”苏文至今已经收集有 85 万张照片,照片主要集中在 1985 年到 2005 年。很多照片都相当有年代感。

有一张照片,是一个三口之家站在一块写着“八仙过海”的石碑旁合影。照片下方,写着“仙气”两个大字的干冰机缓缓喷出白色烟雾。一侧的招牌上还清楚地写着:“每片收费一元,仙气收费一元。”苏文把这张照片发到网上,戳中了很多人的笑点。

点评:谁家没几张这样的老照片?当这种大规模的影像呈现出来,成为我们的集体记忆时,戳中人们的笑点和泪点时,要感谢这位有心的法国人。

(喜平)



剧场

关于《风雪夜归人》舞台语言的杂想

■么辰

6 月,《风雪夜归人》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再次上演,以张秋歌、余少群、程莉莎为首的大剧院戏剧演员队,为观众再现了这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抛开整场演出中极佳的舞美设计以及配乐不谈,话剧《风雪夜归人》成功的基础还是剧本本身的优秀。吴祖光不愧为民国才子,他的文字可以用“富丽”来形容,善于将人生百味用诗意的语言来加以表现。通读《风雪夜归人》的剧本,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以下这样两句话。

魏莲生:

好大的城……

好多的人……

好难过的岁月……

好热闹的世界……

这是剧中魏莲生最后说的话,也是《风雪夜归人》中我最喜欢的台词。经历了人世的起起落落,包括烈火烹油的鼎盛繁华和冷冷清清的落魄晚景,莲生在最后一次惨淡谢幕后,回到了风雨如磬的故园,他要找寻从前留在这里的脚印子,此时的他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无论是在台上台下,自己始终都是一个玩偶,纵然曾为一代名伶,身受无数追捧,却根本无法改变可悲的命运,到头来终归是别人手心里抛来掷去的骰子,只留得黄土一抔、白雪一捧来将自己埋葬。“好大的城……好多的人……好难过的岁月……好热闹的世界……”这样几句看似矫柔的感慨,却可以看出莲生对于这个世界的热爱和眷恋,正像阮玲玉在生前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新女性》中发出的呐喊:“您救救我,我要活啊!”其实都是当事人临死之时对于这个世界的最后一丝留恋,在厌恨里夹杂着深爱——是的,莲生如此深爱着生活过的人世,虽然它充斥着洗刷不尽的罪恶,吴祖光在全剧的最后说:“然而风刮得还不够!还不够!雪也要下得更大才好!谁不向往于北方的冰山、那终古无瑕的银装世界?人间的罪恶多么需要这无边的风雪来洗刷啊!”一夜的风雪交加,却涤荡不尽人世中的种种罪孽和不公。

“世间公道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这是吴祖光在最后一幕《尾声》开场前写下的话,类似地,还有一句话叫作“死亡使人平等”,一个人纵使成为苏弘基、徐辅成那样的“人生赢家”,终难抵挡时间的摧残,时间会让红颜变成白发,会让白云变成苍狗,会让沧海变成桑田,在岁月的眼里,你我不过都只是一个瞬间,个体生命的荣枯浮沉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光阴似流水,一去二十年,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苏弘基、徐辅成、魏莲生,等待他们的都只是八个字:芳华已逝、青春不再。作者站在了自然的视角来俯视着舞台上的众生,并且由此道出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认为《风雪夜归人》剧本的语言远远好于故事情节,相比于语言,全剧的情节略显单薄,尤其是对于莲生和玉春的事败写得有些草率。但是正所谓瑕不掩瑜,《风雪夜归人》仍然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部值得夸耀的作品。